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 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

廖振富*

摘 要

臺灣近代人物日記的發現與整理，對臺灣文史研究具有相當顯著的貢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主持編纂兩套櫟社成員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帶動不少相關研究。由於筆者研究櫟社多年，2006年經由櫟社社長傅錫祺後人主動告知，始有幸獲睹多達35冊的〈傅錫祺日記〉，其後經家屬支持，以「傅錫祺日記之編纂與出版計畫」為題，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目前正全力整理中。

本文旨在介紹〈傅錫祺日記〉之發現、整理經過，除簡介傅錫祺生平事蹟、初步比較四套櫟社人物日記之外，全文重心集中在文化與文學議題，鎖定「文學結社」與「現代性體驗」為焦點，分析〈傅錫祺日記〉的研究價值。「文學結社」，切入角度有四：(1) 櫟社集資買彩票的意涵；(2) 蔡惠如、連橫等人事蹟的新發現；(3) 櫟社「多元圖像」的新發現；(4) 「崇文社」與「中教事件」相關資料。至於「現代性體驗」，則分別就下列三個議題舉例分析：(1) 身體改造：斷髮經驗的複雜意涵；(2) 文學傳媒的籌組與運作：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的發行；(3) 境外知識的移入：向日本、中國購書的相關記載。至於其他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則有待整理完成後，由學界共同深入研究。

關鍵字：傅錫祺、櫟社、日記研究、現代性、傳統文人

*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來稿日期：2011年5月9日；通過刊登：2011年8月17日。

- 一、前言
 - 二、傅錫祺的生平與日記簡述
 - 三、櫟社相關人物日記之對照簡述
 - 四、〈傅錫祺日記〉之研究價值舉隅
 - 五、結論
-

一、前言

日記是重要的研究史料，以日記為主要素材豐富臺灣史研究，則是晚近的研究趨勢之一。近年學界陸續出版多種臺灣近現代人物的日記，對促進臺灣文史研究有明顯的貢獻。其中，倡導最力的首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十年來該所出版的日記，包括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¹《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²《簡吉獄中日記》、³《黃旺成先生日記》⁴等。另外，許雪姬主編的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⁵國史館出版的《楊基振日記》⁶等，也都是具有豐富史料價值的近代臺灣人物日記。論臺灣學界推動「日記研究」最力的代表學者，當非許雪姬教授莫屬，多年來他持續付出龐大的心力與關注，主持研討林獻堂、張麗俊、黃旺成等人日記的「日記解讀班」，進而整理出版，公諸學界，並結合學界力量主辦

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0-2011）。至2011年為止，已出版21冊，涵蓋年代1927-1949年。

²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2009）。全書共三冊，2001年出版上、中兩冊，2009年出版下冊。

³ 簡吉著、簡敬等譯、陳慈玉校注，《簡吉獄中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5）。

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10）。迄2010年12月為止，已出版七冊，日記涵蓋年代1912-1919年。2011年2月至7月，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期間，有幸參與許雪姬教授主持的「黃旺成日記解讀班」每週一例行的研讀活動，深刻感受解讀班嚴謹而融洽的學術氣氛，與全體成員認真參與的精神，個人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臺中：臺中縣文化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4）。完整日記十冊，涵蓋年代1906-1937年。

⁶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臺北：國史館，2007），上、下冊。

過三次以日記研究為主的研討會，會後出版兩種會議論文集，帶動不少相關研究，累積可觀的研究成果。⁷

就文學領域而言，近年學界先後出版數種日治時期新文學家的日記，如許俊雅、楊洽人主編的《楊守愚日記》，⁸ 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⁹ 張良澤主編的《鍾理和日記》、《吳新榮日記》¹⁰ 等，也都頗受矚目。除此之外，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曾在 2008-2009 年舉辦「臺灣日記文獻經典讀書會」的活動，邀請相關學者進行日記導讀，總共進行 12 次，研讀日記多達 12 種，日記作者包括政治人物、文學家、藝術家等。¹¹ 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2008 年 12 月出版的《臺灣文學學報》第 13 期，也以「日記、傳記與精神史研究專輯」為題，收錄五篇相關論文，¹² 顯見以日記為素材展開的相關討論、研究，正受到普遍重視而蔚為潮流。

依現況觀察，這些以日記為主要的研究，涵蓋主題非常廣泛，從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水利、醫療、體育、音樂、戲劇、旅遊、文學、休閒娛樂、性別議題等，都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相對之下，以個人學術專業觀察，筆者發現在文學領域藉助日記從事文學議題的研究者為數不多，且以新文學家較受重視，如鍾理和、呂赫若、吳新榮等人向來是新文學研究者矚目的對象，日記常被運用在作

⁷ 這三次研討會，第一次是 2004 年 11 月，在臺中清水臺中縣港區藝術中心舉行的「水竹居主人日記研討會」；第二次是 2006 年 12 月，在臺中霧峰明臺高中（霧峰林家「菜園」原址）舉行的「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第三次於 2010 年 8 月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合辦，仍以「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為名。前兩次會議結束後，皆出版正式的論文集，即：王見川等著，《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上、下冊。

⁸ 許俊雅、楊洽人主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

⁹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全書共兩冊，一冊為日文原書複印製版，一冊為中文翻譯本。

¹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

¹¹ 該讀書會在 2008-2009 年舉行，第一年研讀日記，包括許秦蓁導讀《劉吶鷗日記》、張炎憲導讀《蔡培火日記》、《雷震日記》、張良澤導讀《吳新榮日記》、廖振富導讀《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二年研讀日記，則包括廖振富導讀《傅錫祺日記》、《葉榮鐘日記》，何鳳嬌導讀《楊基振日記》，張良澤導讀《鍾理和日記》、許進發導讀《簡吉獄中日記》、王惠珍導讀《呂赫若日記》等。

¹² 收錄於《臺灣文學學報》第 13 期的這 5 篇論文，分別是：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 1-64；林淑慧，〈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頁 65-92；孫大川，〈身教大師 BaLiwakes（陸森寶）：他的人格、教養與時代〉，頁 93-150；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頁 151-178；賀安娟，〈生活在大都會：臺灣人旅日回憶錄〉，頁 179-204。

家創作歷程，及作品寫作背景的脈絡下進行討論。就古典漢文寫作傳統而論，則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最受關注，近年陸續出現三篇碩士論文，分別討論日記中收錄的文學作品、對聯、文學史料，¹³ 這可能跟這套日記資料的豐富性有很大的關係。至於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的研究，則廣泛涉及上文提及的各類議題，但較少屬於文學領域。

筆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古典文學，多年來著力研究日治時期頗負盛名的詩社——櫟社，2006年3月由國立編譯館出版新著《櫟社研究新論》，總結研究成果。該書第一章〈櫟社文學史料的蒐集與研究〉，曾分別介紹三套與櫟社相關的日記，分別是〈林癡仙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以及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¹⁴ 但當時筆者並未獲知有〈傅錫祺日記〉的存在。2006年9月，由於應邀在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教師碩士專班）兼課的機緣，獲悉班上學生羅琬琳（現任臺中縣潭子國小教師）為櫟社社長傅錫祺的外曾孫女，偶然從交談中得知她正在閱讀外曾祖父傅錫祺的日記。經由她的引介，筆者結識其母親傅紅蓮女士，¹⁵ 透過傅女士的協助，取得其家族的信任，並得以陸續翻閱多達35本的〈傅錫祺日記〉原件。其中，少數以鋼筆書寫的日記雖已有嚴重破損缺頁，字跡模糊漫漶難辨，但多數以毛筆書寫的日記，都仍字跡清晰。經初步檢視，深感學術價值重大，亟需搶救整理出版，以提供臺灣文史學界研究參考。其後，筆者即以「傅錫祺日記之編纂與出版計畫」為題，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¹⁶ 目前正在全力整理中，未來將尋求相關單位的合作，正式出版。

為了向學界公開介紹這套新發現的珍貴史料，並尋求多方資源與團隊力量，筆者在持續進行整理工作的同時，決定先行撰寫本文。全文在簡述傅錫祺的生平之後，接著介紹這套日記的由來與大致內容，並列表比較四套櫟社詩人日記的特

¹³ 這3本碩士論文是：賴恆毅，〈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陳麗娜，〈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收錄之對聯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9）；黃琇紋，〈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之臺灣文學史料分析〉（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¹⁴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頁46-51。

¹⁵ 傅紅蓮女士生於1939年，為傅錫祺之孫女。傅女士之父傅春魁生於1892年，為傅錫祺之長子，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與賴和為同級同學，日治時期曾遠赴印尼開業，後來長期在家鄉潭子開設成春醫院，戰爭時期加入櫟社，是該社第二代社員。

¹⁶ 「傅錫祺日記之編纂與出版計畫」為兩年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96-2411-H-005-011-MY2。

質。至於本文重心，則選定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主軸，就「文學結社」與「現代性體驗」兩大部分，初步分析其豐富的研究價值。關於「文學結社」的討論，將以櫟社為焦點，分析日記中關於櫟社集資購買彩票、擬請王學潛退社等記載的特殊訊息，以及考察社員生平行蹤的參考價值，乃至與崇文社之互動、中教事件的儒佛爭端。關於「現代性體驗」的討論，則集中分析日記中關於「斷髮經驗所映現的複雜意涵」、「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之發行」與「境外知識之移入：向日本、中國購書相關記載」等相關議題。

二、傅錫祺的生平與日記簡述¹⁷

（一）傅錫祺的生平與社會角色

傅錫祺（1872-1946），字復澄，號鶴亭。臺中潭子人，其父傅董來成¹⁸以銀匠為業，一度務農，家境小康。傅氏自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893年（22歲）考中秀才，隔年原擬赴福州應舉，因中日甲午戰役，官船不行，途至臺北而返。1895年日本領臺，傅氏時年24歲，以擔任家庭教師為業，1899年起改在家授徒，並兼任《臺灣日日新報》通信記者。1901年應聘為臺中《每日新聞》（後改名《臺灣新聞》）記者，1906年曾一度辭去該職，1907年重新續任至1918年2月止。

詩社活動方面，於1906年加入櫟社，為九名創社發起人之一，長期負責該社活動聯繫、社員資料整理與記錄、基金保管與運用等重任，是該社靈魂人物。¹⁹

¹⁷ 以下生平介紹，主要引自廖振富，〈傅錫祺《鶴亭詩集》所反映的人生抉擇〉，收於氏著，《櫟社研究新論》，頁484-486。

¹⁸ 傅錫祺的祖父名興祖，祖母董昭，父親傅董來成，「傅董」為複姓，應是襲自父母姓氏而來。根據傅錫祺修訂族譜，轉述父親的說法：「嘗聞乾道則成男，坤則成女。自傅董合配成夫婦，正是乾坤合德，共承兩姓之香祀。此可謂兩全其美，無失世代之善策也。」參考羅琬琳，〈傅錫祺及其《鶴亭詩集》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頁11-26。

¹⁹ 自傅錫祺1906年加入櫟社之後，便負責該社基金之實際收支、保管，並將基金存在銀行，以賺取利息，提供詩社活動之用。1917年接任社長之後，仍然持續負責此一重任，保管該社基金前後長達40年之久，推測應該是他的個性謹慎持重，獲得全體社員的信賴所致。1946年傅錫祺去世後，櫟社基金儲存在彰化銀行的存摺，大約在1950年代由傅錫祺長子傅春魁轉給葉榮鐘保管（根據葉榮鐘家屬保存的信函可知）。目前葉榮鐘家屬已將相關書信及櫟社基金存摺捐贈給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筆者2006年曾在該館查閱過。另外，傅錫祺家屬目前仍保存由傅錫祺以工整毛筆書寫的「櫟社金錢出納賬」一冊，記錄時間從1906年到1946年，長達41年。至於櫟社社員進退、死亡資料的記錄保存，以及詩社活動的聯繫通知，也都是由他負責，從其家族保存的櫟社史料可以確定。

1917年櫟社原任社長賴紹堯去世，傅氏被推選為社長，從此即擔任社長職至1946年去世為止，大約30年。傅氏一生對櫟社參與完整，感情投入甚深，並先後撰成《櫟社沿革志略》、《增補櫟社沿革志略》等，對保存櫟社史料居功厥偉。

在社會活動方面，傅錫祺曾與潭子地方士紳於1919年創設潭仔墘信用組合，並被選為理事兼組合長。1920年6月，受日本官方任命為潭仔墘區長，10月1日地方制度改正，改任潭子庄長；此一職務任期至1925年10月始「依願免職」，即使官方希望他能續任，他仍然堅定表態辭職。²⁰後來在1929年10月，由於日本官方的再三要求，傅氏重任庄長職，直到1935年11月才正式退職。傅氏兩次擔任庄長，合計長達11年4個月。

傅氏出身工匠小康之家，由於個人勤學且受過紮實的傳統詩書教育而考中秀才，雖因時代變局而中斷科舉之路，但仍無礙他晉身社會的士紳階級。因此，自然成為日本官方所籠絡的對象。他的個性勤儉務實而保守，非常重視兒女教育，長子、次子、四子都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除了四子春鏡在學期間病故，長子、次子則在醫學校畢業後曾赴印尼爪哇泗水、中國青島等地開設診所，因而逐漸累積財富。1936年傅氏因長子在印尼泗水事業成功，而購入土地四甲多，成為有田租收入的小地主，自謂是「平生一快意事」。

1940年代，日本統治末期，櫟社第一代成員已凋零殆盡，傅錫祺與林獻堂兩人試圖重振櫟社聲威，招募原社員的子弟門生加盟。傅氏並定期到霧峰為年輕學子講解史記、教導漢詩寫作，目的在希望延續漢族文化傳統。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而退出臺灣。重歸祖國懷抱曾帶給傅氏短暫的狂喜，但陳儀來臺後的施政，又使他迅速對當局極度失望，1946年8月27日，傅氏以75歲高齡病逝潭子家中。²¹

²⁰ 根據1925年3月27日日記：「當局對平松禽獸訓導之處分似有從輕之意，午后因提出庄長辭職願。」可知：傅錫祺辭退庄長職的導火線，是因為豐原公學校訓導平松氏涉及嚴重的性侵女學生事件，日本官方處置過輕，只將平松免職，使傅錫祺大為不滿（平松氏1925年1月到職，3月便爆發性侵害事件，〈傅錫祺日記〉曾記載他代表地方人士與學校的交涉經過，處理過程與結果使他極為憤怒）。後來官方一直遊說他打消辭意，此事遂延宕下來。6月，傅錫祺應林子瑾之邀，赴中國協助商務，他仍透過在臺灣的長子傅春魁再三表達辭意，一直到10月，日本官方才正式同意他辭職。

²¹ 本節所述傅錫祺生平，主要參考《鶴亭詩集》所附的〈生平紀要〉及《櫟社沿革志略》。參見傅錫祺，《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下冊；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傅錫祺的社會身分，包括報社編輯與記者、詩社社長、潭子庄長、潭子信用組合理事兼組合長，社會活動涵蓋多重領域，諸如文學結社、傳統文人互動、新聞傳播媒體、地方行政事務、地方產業與經濟活動等。單從這點來看，就可以斷定他的日記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

（二）〈傅錫祺日記〉簡述

1. 〈傅錫祺日記〉之保存情形

根據傅錫祺自撰的〈生平紀要〉，明治 35 年（1902）記載：「自本年起，逐日書要事於日記。」²² 經筆者實際核對清查，傅錫祺後人所保存的〈傅錫祺日記〉，有以下 35 冊；包括日治時期 34 冊，及戰後 1 冊，依年代先後，分別是：

（1）明治 35 年至 45 年（1902-1912），共 11 冊。

（2）大正 2-14 年（1913-1925），共 13 冊。

（3）昭和 2、4、6、7、8、11、12、15、16、17 等年，共 10 冊。

以上，明治及大正年間共 24 冊（1902-1925），保存完整。而昭和年間目前僅尋獲 10 本，據其後人轉述，係因舊宅整建而佚失，目前缺昭和 1、3、5、9、10、13、14、18、19、20 等年。即西元 1926-1942 年間，缺 1926、1928、1930、1934、1935、1938、1939，1943-1945 等年。

（4）戰後階段：民國 35 年（1946）1 冊，傅氏去世於此年的 8 月 27 日，記載則止於去世前 10 天的 8 月 17 日。

以上現存日記，合計 35 冊，如果傅錫祺撰寫日記未曾中斷，自 1902 至 1946 年，總數可能有 45 冊，若然，則共缺昭和年間 10 冊。但其中昭和 16 年（1941），只到 9 月 18 日止，9 月 19 日以後已佚失。

2. 日記型式、書寫工具、文字內容之辨識

以上 35 冊日記，除民國 35 年 1 冊，是自行以十行紙裝訂成冊之外，其他 34 冊日治時期的日記，皆是購買現成印妥日期的小冊日記書寫，大多數名為「懷中日記」（袖珍本，方便隨身攜帶之用），少數名為「當用日記」，則欄位較大，

²² 參見〈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頁 373。

可記錄較多內容。而受限於欄位狹窄，²³ 其記錄的性質，推測屬於記事備忘之用，但遇重大事件則常以較長的篇幅書寫。

日記外表多數尚屬完好，但由於年代久遠，有數冊外殼破損，所幸內頁大多仍屬完整。至於書寫工具與文字的辨識，因大多數日記是以小楷毛筆工整書寫，墨色濃黑，字跡清晰，文字辨識多無障礙，內容屬於淺近的文言體。其中，破損較嚴重、辨識困難的，反而是年代最近的民國 35 年（作者臨終之年）這冊的前三個月，其原因有二：一則書寫工具，本冊日記 1-3 月使用鋼筆，字跡因曾經浸水而模糊不清，部分內容辨識困難；一則因日記是以普通十行紙裁製而成，無硬殼封面保護，開頭數頁因浸水而緊黏無法撕開（強行撕開則勢必破損）。幸好 3 月 30 日起，到 8 月 17 日為止，作者又恢復以毛筆書寫，內容完好無缺。

三、櫟社相關人物日記之對照簡述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林癡仙日記〉、〈傅錫祺日記〉，以上四部日記，前兩部已出版，〈林癡仙日記〉雖未出版，但已被相關研究者運用，只有〈傅錫祺日記〉是學界首度發現的珍貴史料，冊數最多、涵蓋時間最長。四部日記各有特色，對臺灣文史領域的研究助益甚大。專就文學研究而言，它們提供極為龐大可觀而息息相關的文學史料，彼此既能分別作個案研究，又可合觀，進行互相對照、比較之研究，茲將四部日記列表簡介如表一。

以上四人，論知名度，林獻堂是全島聞名的政治運動領袖人物，林癡仙是著名傳統詩人，也是櫟社創辦者，在文學領域享有盛名，張麗俊則是僅具地方知名度的傳統士紳。而傅錫祺的聲名與財力，雖不如林獻堂、林癡仙，但論社會活動、知名度與文壇影響力，又明顯大於張麗俊，也未必弱於 1915 年早逝的林癡仙。再者，由於他壽命長，長期負責櫟社基金收支保管、史料記錄與保存，而且參與全臺文學活動的時間相當長，若就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而言，他的重要性甚至還大於林癡仙、林獻堂。

²³ 傅氏早期購買之懷中日記，每頁分上、下兩欄，印妥兩天之日期、星期、天氣。後期購買者，每日一頁，欄位較大，可記錄較多內容。

表一 櫟社人物日記對照

日記 項目	林獻堂 《灌園先生日記》	張麗俊 《水竹居主人日記》	林癡仙日記	傅錫祺日記
涵蓋年代	1927-1955，前後共 28 年。	1906-1937，前後共 32 年。	1906-1915，前後共 10 年。	1902-1946，前後共 45 年。
原本日記 現存冊數	26 冊（缺 1928、1936 年）	27 冊（1922-1923 年 2 月 15 日缺）	約 7 冊，1907、1910、1911、1912 等年未見。	35 冊（目前缺昭和年間 10 冊）
寫作特色	鋼筆工整書寫，篇幅長短不一，內容詳盡，史料豐富。	毛筆工整書寫，篇幅長短不一，內容詳盡。常抄錄不少新聞或詩文。	以毛筆或鋼筆書寫，內容零散，時記時停。	毛筆工整書寫（少數以鋼筆書寫），多數內容簡短，少數篇幅略長。
作者身分	大地主、臺灣民族運動領袖、櫟社之主要支持者，屬於全島知名人物。	地方保正、豐原慈濟宮修繕委員、櫟社之外圍成員（忠實參與者，但非核心人物）。	地主、著名傳統詩人、櫟社創辦人。代表作《無悶草堂詩存》，是日治時期著名詩集。	報社編輯、潭子庄長、信用組合長、長期擔任櫟社社長，全島知名之傳統文學家。
日記整理 出版情形	迄 2011 年 11 月為止，已由中研院出版 21 冊，1927-1949 年。	全套 10 大冊，已由中研院於 2004 年完整出版。	1995 年由筆者首度用於研究，經中研院臺史所複印收藏後交還家屬保管，未出版。	2006 年面世，由家屬複印交給廖振富持續整理中，原書由家屬保存。

他們四人的共同交集是都屬於櫟社成員，以現存資料判斷，林獻堂與張麗俊除了是社友關係之外，互動極少，並無特殊交情。²⁴ 林癡仙、林獻堂則是堂兄弟關係，林獻堂極佩服癡仙的文學才華，並在癡仙去世多年後，大力促成其遺詩《無悶草堂詩存》的出版。至於傅錫祺，則分別與林癡仙、林獻堂、張麗俊三人都有頻繁的互動。傅錫祺與張麗俊都曾師事謝頌臣（丘逢甲的表哥），有同門之誼，兩人與謝頌臣及其家人，長期保持密切的聯繫往來。²⁵ 從地緣來看，傅住潭子、張住豐原，兩地緊鄰，張麗俊加入櫟社，極可能就是傅錫祺之牽線。而林癡仙早年曾定居潭子聚興庄，與傅錫祺互動甚多，與張麗俊互動較少。傅錫祺長期擔任櫟社社長，與霧峰林家的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等人交情深厚。尤其 1940 年代，櫟社第一代成員凋零殆盡（林癡仙、林幼春分別病故於 1915、1939 年）之後，傅錫祺更與林獻堂同心協力，吸收訓練第二代社員，以重整櫟社聲威，兩人交情超過 40 年，可說是長期在詩社活動領域並肩奮鬥的老友。

綜合上述，以傅錫祺的地緣與人脈關係來看，不難想見：其日記中的記事，必然與林癡仙、林獻堂、張麗俊三人的日記有不少交集，足以互相印證補充，或

²⁴ 根據許雪姬研究發現：林獻堂日記中出現的張麗俊，除相關櫟社詩會外，僅記載其死亡之後曾發一帛電。參見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一冊，頁 47。

²⁵ 林癡仙與謝頌臣則是忘年交，交情甚深，林癡仙曾為謝頌臣編輯《科山生壙詩集》。

提供對照研究的素材。就內容而言，由於四人的社會角色有異有同，日記記載的內容自然有所差異，僅就目前閱讀印象簡要說明如下。

〈林癡仙日記〉以詩社及文人活動為主，家族生活為輔。由於日記保存年代短、紀錄零散，牽涉的人際社交圈較為單純，其中關於兩件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頗具史料價值：其一是關於臺中中學的創校，林癡仙曾為募款積極奔走；其二是他因參與「同化會」而遠赴日本，最後失望而回，落得抑鬱以終。另外，日記生動記錄他縱情酒色與積極振作之間的矛盾心態，對瞭解其文學世界，提供具體輔證。而他常仔細記載日常生活的金錢開銷與流向，則反映個性務實的一面，與印象中詩人浪漫的性格大相逕庭。再者，他曾一度動念學日文，並從日本購買大量圖書，反映他有意改變消沉性格的具體作為，對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生活與心態，提供不少寶貴的材料。²⁶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由於他個人的社會身分多元，內容記載詳細，保存份量龐大，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學、文化、宗教、藝術、體育等各種領域，史料價值極高，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幾乎都可以找到具有參考價值的材料。目前被研究者使用最頻繁，累積研究成果也最為豐碩。單以《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一書所收錄的論文觀察，便有七篇論文討論這部日記中的各類議題，包括法律（訴訟）、經濟（收購米糧）、宗教（基督教與佛教）、身體衛生觀、體育、音樂。²⁷ 至於近年其他研究著述，大量取材或參考自《灌園先生日記》者，更是難以勝數。譬如筆者《櫟社研究新論》，以專章討論連橫被櫟社開除的風波，並透過此一事件的相關史料，重新評估櫟社「抗日」屬性的論述，主要資料也是得力於《灌園先生日記》的記載。²⁸

在這四人中，雖然張麗俊的社會身分角色（豐原地區的保正、慈濟宮修繕委員、櫟社一般社員）相對並不突出，但他的《水竹居主人日記》，由於記錄年代長，內容非常豐富，因而具備多方面的研究價值。根據許雪姬的研究，其內容涵蓋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生活史（庶民生活與休閒娛樂）、公共衛生史、

²⁶ 關於〈林癡仙日記〉的討論，可參見李毓嵐，〈〈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 37-87。

²⁷ 參見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討論《灌園先生日記》的七篇論文集集中在下冊。

²⁸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307-376。

民變史、對日本統治的看法等不同面向；至於其史料價值，許教授更分別從（1）政治運動史資料，（2）保甲制度相關資料，（3）文學史資料等三個角度，作了初步介紹。²⁹ 學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水竹居主人日記研討會論文集》，該書收錄論文多達 14 篇，涵蓋各種議題。而以文學領域觀察，近年已出現三篇碩士學位論文，全面討論日記中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料。³⁰

至於〈傅錫祺日記〉，因屬於新發現的日記史料，目前仍由筆者整理中，並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洽商合作出版，尚未正式公開。其史料價值，除了本文以下將討論的文學與文化議題之外，其他諸如個人生活史、地方教育、新聞媒體、醫療經驗、經濟活動、地方行政運作，乃至臺灣傳統文人的中國旅遊觀察、臺灣的日本殖民統治史等諸多議題，可探討空間極大。另外，歿於戰後 1946 年的傅錫祺，也與林獻堂有密切互動；許雪姬教授初步瀏覽 1946 年的〈傅錫祺日記〉（筆者提供的影印本），發現：關於林獻堂「臺灣光復致敬團」的籌組與行程安排，在〈傅錫祺日記〉也有一些可參考印證的線索。³¹ 不過這套日記內容篇幅短小，記載過於簡略，是最大的限制。

四、〈傅錫祺日記〉之研究價值舉隅

誠如前述，傅錫祺由於兼具多種社會角色，參與的社會活動牽涉多重領域，日記所記載的內容，廣泛觸及文學結社、傳統文人互動、新聞傳播媒體、地方行政事務、地方產業與經濟活動等。又因為其人個性與社會角色的特殊性，足可作為傳統文人研究的典型個案；若從傳統文人精神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也具有相當的研究意義。由於涵蓋領域甚廣，牽涉各種不同學門知識，以下僅就筆者專業範疇，暫時鎖定以文學與文化相關議題為討論焦點。

²⁹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原發表於《中縣文獻》6（1998年1月），頁1-34；後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一冊，書前頁1-51。

³⁰ 賴恆毅，〈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陳麗娜，〈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收錄之對聯研究〉；黃琇紋，〈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之臺灣文學史料分析〉。

³¹ 許雪姬關於此一議題最新研究成果為〈「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18: 2（2011年6月），頁97-145。

(一) 文學結社

傅錫祺 1906 年加入櫟社，是所謂「創社九老」之一。由於他當時在臺中的報社工作，核心社員主要分布在霧峰、清水、鹿港、苑裡等地，實質上是扮演櫟社聯絡中心的角色。而其家屬保存的櫟社原始史料顯示：他早在 1906 年該社組織化之始，便承擔活動聯絡、資料保存記錄、基金保管運用等重要工作，因此說他是櫟社的靈魂人物一點也不為過。更別說 1917 年正式接任社長以後，一直到 1946 年去世為止，他的一生完整見證櫟社的興衰。因此，其日記所載關於櫟社史料之多，自不待言。以下試舉出數項資料，具體論證其研究價值。

1. 櫟社集資買彩票之意涵

根據 1910 年通過的〈櫟社決議書〉，社員需繳基金。³² 傅錫祺因負責、穩重的個性深獲信賴，根據其家屬保存的「櫟社金錢出納帳」推測，可能自 1906 年起便擔任該社基金的保管人，直到戰後去世為止，時間長達 41 年（1906-1946）。比較有趣的是，該社正式組織化是 1906 年，成立初期的活動經費，多出自發起人林癡仙的慷慨解囊或少數社員贊助，並無固定來源。而從〈傅錫祺日記〉的記載可發現，1906-1907 年間該社曾共同集資，購買數回彩票，日記中有以下相關記載：

1906 年 10 月 27 日：午后往葫蘆墩，交金壹円與廖盛祥氏，買首回彩票之額。

1906 年 12 月 14 日：午后購得櫟社合眾之第二次彩票一枚。

1907 年 1 月 31 日：第二次彩票本日開彩。

1907 年 2 月 6 日：又至郵便局寄金往臺北，登錄櫟社社友合買之彩票（第五回）一號。

³² 這份〈櫟社決議書〉通過的時間是 1910 年 4 月 26 日，第 1 條規定社員分特別社員與普通社員兩種，第 2 條規定：「特別社員又分為三種，甲種者出金百元以上，乙種者出金五拾圓以上，丙種者出金參拾圓以上」，1920 年通過的「櫟社規則」第 17 條規定「新入社員每人要出金四拾圓以上以作本社基本財產金。」該決議書及櫟社規則影印本，可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士日記》，第十冊，頁 337-338、341-343，附件 13、15。

1907年3月14日：接彩票局寄來登錄之第五次彩票一號。

1907年3月18日：接莊雲從君托黃炎盛君帶來第四次彩票，三五三九四號九分條，及剩金十元。

1907年3月20日：寄金十一元四十錢往彩票局，登錄第六次彩票，四五八三七或三三八四九壹號。

1907年3月24日：前日以第五次彩票貳格寄與林癡仙，嗣接其送來金四元，故本日以第四次彩票參格，及剩金貳角貳點，著魁兒送去。（底線為筆者所加）

根據吳文星的研究，臺灣總督府治臺之初，財源多仰賴國庫鉅額補助；1898年為謀改善財政，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履任不久，即有發行彩票的構想。歷經多年研議，終於獲得中央政府同意。總督府在1906年6月發布「臺灣彩票發行律令」，9月正式發行首期彩票，實施之後，引起民眾熱烈的搶購熱潮；尤其日本國內民眾成為主要購買者，比臺灣人更熱烈，導致日本資金流入臺灣，問題叢生。1907年3月20日，因中央政府壓力而不得不宣布終止，前後僅發行五期彩票。³³

在〈傅錫祺日記〉中，有四期彩票的購買紀錄（第六期原擬購買，不及發行而終止），卻不曾中獎。由於日記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判斷集資者購買彩票的樂社成員有多少人，而集資購買之目的，推測應該是為籌措樂社活動的基金。

該社早在1906-1907年間，便集體參與這種殖民政府所創設的新興「經濟活動」，這確實是很有趣的發現。

過去關於樂社的相關研究，總連結到「保存漢文化」精神層次的宏大敘述之下，卻忽略文學社團維持穩定運作的現實面與經濟問題。固然樂社的創社宗旨，曾標舉「以風雅道義相切磋，兼以實用有益之學相勉勵」³⁴的崇高理念，但集資購買彩票的現實作為，卻充分顯示這個社團的務實面，而該社的常態性經濟來源及運作模式究竟如何，尤其值得關注。值得注意的是，詩社後來在彩票終止發行三年後的1910年，明確訂定繳交基金的辦法，並以基本財產金每年的孳息當作樂

³³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彩票制度之探討〉，《師大學報》33（1988年6月），頁283-300。

³⁴ 參見傅錫祺，《樂社沿革志略》，頁1。

社開詩會的經費來源，這是奠定該社能長久順利運作的重要基礎；如此基於務實需要而擬定的辦法，確實相當有遠見。³⁵ 該社能設想、規劃如此周全，當然是由於詩社維持長期運作需要固定的活動基金，不可能只仰賴少數人挹注。或許是有感於先前寄望以買彩票獲取巨額彩金，終究只是機會渺茫的短暫投機行為。

另外，傅錫祺家屬至今仍妥善保存一冊傅錫祺親自以毛筆抄錄的「櫟社金錢出納賬」。該帳冊詳細登記 1906 年至 1946 年，該社資金的收支情形，更可證明該社能長期穩定運作，舉辦多次全島性的大型詩會活動，並製作創社二十年紀念碑、三十年紀念鐘，出版《櫟社第一集》、《櫟社沿革志略》、《增補櫟社沿革志略》等專書，必須歸功於穩固的經濟來源。而傅錫祺長期保管基金，持續數十年以耐心、負責的態度鉅細靡遺詳實記帳，以及深受社員信賴的道德操守，亦有絕對的關連。

2. 蔡惠如、連橫等人事蹟的新發現

傅錫祺長期擔任櫟社活動的聯絡人，其日記記錄不少櫟社成員相關訊息，可具體考察櫟社社員生平、行蹤與經歷。以櫟社成員的報社經歷為例，傅錫祺長期任職於《臺灣新聞》報社，擔任漢文主筆。而櫟社詩友多人也都曾任該報社記者，如陳瑚、莊雲從、鄭汝南、連橫等人，在〈傅錫祺日記〉中記載甚多。筆者專著《櫟社研究新論》曾各有專章討論上述社員的生平或作品，但對各人行蹤仍有不明之處；這些資料將可更細密彌補闕漏，甚至修正先行研究的錯誤。以下嘗試加以舉例說明。

上述諸人，幾乎都是經傅錫祺居中介紹而進入報社。另外，傅錫祺本人曾在 1906 年底因不滿新接任的社長安土直次郎之作風而短暫去職，1907 年 12 月才

³⁵ 根據 1910 年 4 月 26 日〈櫟社決議書〉，可發現該社之運作順暢、組織健全，與該社活動經費有固定來源有絕對的關係。該決議書開宗名義就提到：「夫詩社之設，乃詩界之團體，風雅之機關也。欲團體之鞏固，機關之敏活，使其維持於久遠者，其策伊何？則惟有立基本財產為最善之策也。吾人結社之初心，既云欲扶輪風雅，切磋道義矣，果爾則凡有裨益於我社之舉，當無不勇為，今對此立基本財產之倡議，敢有異言乎！」1910 年 4 月 26 日〈櫟社決議書〉原件，傅錫祺、張麗俊家屬均有保存。又，據《櫟社沿革志略》1910 年條目記載：「〔按：庚戌春會〕客散後，議決基本財產所關規則十條。作決議書，定基本財產保管方法五條。是時社友有先退者，在場十一人；記贖金若干。」（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頁 7。）再參考〈傅錫祺日記〉，可確定這份決議是 1910 年 4 月 23-26 日該社在臺中瑞軒廣邀全臺詩社代表出席，擴大舉辦「庚戌春會」會後在 26 日所定，可以看出該社「永續經營」的決心與務實作法。

再度因該社新任社長山移定政之勸說邀請而復職。³⁶ 櫟社詩人中，最先從報社離職的是陳瑚，確定時間是 1906 年 6 月 4 日，³⁷ 他並推薦莊雲從接任該職，時間在 1906 年 7 月。³⁸ 而鄭汝南也在同年 12 月 17 日入社任職，接替短暫去職的傅錫祺。³⁹ 但莊雲從在 1908 年 1 月就因時常怠勤而使日本籍主管有意加以解職，鄭汝南則因工作表現較勤奮而被留用，⁴⁰ 後來莊雲從終於在 1908 年 3 月 30 日正式去職。⁴¹ 鄭汝南則持續任職至 1911 年 7 月，因陪林階堂留學東京而去職，並由連橫接替其工作。⁴²

連橫在加入櫟社之前曾前往臺中，到加入該社後，與社員的密切互動，乃至 1912 年主動辭職離開臺中，〈傅錫祺日記〉中都有記載。關於連橫 1908-1912 年旅居臺中期間，其正式職業為何，筆者目前仍不清楚，有可能受聘於霧峰林家經營的合昌商會。⁴³ 而過去相關研究都認為，其任職臺灣新聞漢文部，是從 1908

³⁶ 參見〈生平紀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下冊，頁 374。又根據〈傅錫祺日記〉1906 年相關記載，可知他所不滿的新社長為安土直次郎，1906 年 4 月 29 日：「午后參與於中部日報社之株主總會，岡副社長等俱退股，歸安土直次郎等承辦，本島人各株主俱不滿意。」1906 年 5 月 5 日：「午前出社，新社長安土直次郎欲宴我等於新盛閣，辭之。正午歸家。」1907 年，該報社又由山移定政接任新社長，傅錫祺在 11 月 24 日答應山移氏勸說，重回報社任職。見〈傅錫祺日記〉1907 年 11 月 23 日：「午前廖西東君來訪，傅山移定政氏欲邀余為中部日報記者，余意未決。」11 月 24 日：「午前赴役場。十時頃山移定政氏與廖西東君同至役場，苦勸余為記者，余推託至無可推託之後，乃許之。」12 月 1 日：「午前九時著人雇人盧壽扇行李至潭仔墘驛，乘車至臺中，蓋再就中部臺灣日報記者之職也，即借寓於林寫真館林草君處。」12 月 2 日：「本日至中部日報社勤務。」

³⁷ 筆者〈苑裡詩人陳瑚的文學活動及其創作〉一文，曾考察陳瑚行蹤，但當時未能得知他從臺灣新聞社離職的確切時間，只約略判斷至遲應在 1910 年 4 月以前。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433，註 20。

³⁸ 〈傅錫祺日記〉，1906 年 5 月 31 日：「致書於大甲之莊龍（字雲從）君，問其有意就新聞社之聘否。」1906 年 6 月 6 日：「接莊龍君來信，云欲辭職來就中部日報社之聘也。」1906 年 7 月 11 日：「莊龍（雲從）君本日始就職。莊君贈我席草製手提包一個。」

³⁹ 〈傅錫祺日記〉，1906 年 12 月 17 日：「鹿港之鄭汝南君昨日來寓，蓋欲代余為中部日報記者也。」

⁴⁰ 〈傅錫祺日記〉，1906 年 6 月 2 日：「陳滄玉君午前來。夜冒雨與陳滄玉君訪伊原君於其住宅，蓋陳君欲商量辭職也。」1906 年 6 月 4 日：「午后，陳滄玉君辭職歸去，余送之至葫蘆墩而別，順便歸家。」1908 年 1 月 10 日：「午前后俱入社。夜應山移社長之招至其家即與余商量，欲勸留鄭汝南君，而罷退莊雲從君，以勤怠不同故也。」

⁴¹ 〈傅錫祺日記〉，1908 年 3 月 30 日：「午前十時來中入社。晚為莊君雲從開送別會，以其退社也（會費一円五十錢）。」

⁴² 〈傅錫祺日記〉，1911 年 7 月 7 日：「午后向山移社長商聘連雅堂君入社，月給三十円，蓋鄭汝南君將辭職，與林階堂君留學東帝也。」

⁴³ 參見〈斷髮勵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文中記載：「本社記者謝汝銓氏。提倡斷髮不改裝會以來。各地響應。而臺中合昌商會理事連雅棠〔按：連雅棠，一般寫為「雅堂」，但連橫此一宇號「堂、棠」兩字常混用。〕與臺灣米穀公司長蔡惠如二氏。經於本日正午。各將辮髮斷去。合拍一照為紀念。」報導稱連橫為「臺中合昌商會理事」，「合昌商會」屬於林家產業，且從他當時寓居林家瑞軒來看，受雇於霧峰林家的可能性極高。

年開始，⁴⁴ 但筆者根據〈傅錫祺日記〉發現：他接受傅錫祺推薦進入臺灣新聞社任職，時間應是 1911 年 7 月以後，而且僅僅在職半年左右，隨即在 1912 年 1 月因準備赴中國旅遊而去職。⁴⁵

又如，關於蔡惠如生平事蹟，相關資料極為有限，目前雖有謝金蓉主編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但蒐集資料並不多；筆者接受國立臺灣大學委託，正重新增補修訂該書準備再版。其中，根據〈傅錫祺日記〉蒐集整理蔡惠如的行蹤，大致有以下發現：蔡惠如與櫟社的互動，時間集中於 1905-1914 年，資料多達 45 筆。當時，蔡惠如常在臺中地區活動，1908 年擔任米穀公司負責人。1912 年櫟社十週年大會舉行時間，蔡惠如與櫟社詩友往來非常頻繁，甚至十週年大會舉行數日之後，適逢大雨導致南北交通中斷，北部詩友多人乃應蔡惠如之邀，繼續在臺中米穀公司舉行「大墩小集擊鉢吟」。⁴⁶ 蔡惠如這段「臺中活動時期」約止於 1914 年 8 月 28 日，當天傅錫祺至「臺中停車場」（火車站）⁴⁷ 送獻堂、惠如二君赴東京。此後十餘年間，僅有 1915 年 8 月 23 日「郵送蔡惠如君之繼母輓軸于牛罵頭」、1916 年 12 月 22 日「郵書慰蔡惠如君喪父」兩筆資料，直到 1929 年蔡惠如去世，才又出現相關記載。可見蔡惠如大約在 1914 年以後，長期不在臺灣。據甘得中之說，1915 年蔡惠如與林癡仙共同為響應板垣退助伯爵所提倡的「同化會」生變而親赴日本奔走，後來得知同化會已確定被打壓而取消，蔡惠如乃憤而遠走中國。⁴⁸

⁴⁴ 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48；林文月，《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都如此記載。

⁴⁵ 〈傅錫祺日記〉，1912 年 1 月 8 日：「報社記者連雅堂君提出辭職願。」1912 年 4 月 20 日，櫟社詩人在瑞軒為他與林子瑾兩人餞行，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25 日，第 5 版。

⁴⁶ 櫟社十週年大會擊鉢吟詩稿，後附大墩小集擊鉢吟，現存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室，關於這批詩稿之由來與內容探討，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57-173。

⁴⁷ 日治時期，臺灣的火車站分為停車場、乘降場及信號場三種。停車場在明治後期到大正初期時，逐漸混稱為「驛」，也就是現在所稱的「站」；乘降場大多為臨時性，就是現在的簡易站或是招呼站；信號場則相當於現在的號誌站。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繪，「日治時期鐵路車站分布圖」，下載日期：2011 年 7 月 15 日，網址：thcts.ascc.net/template/sample6.asp?id=rd15-07021。

⁴⁸ 詳見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頁 51-54、151。又，根據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冊，頁 298 記載：1923 年 2 月 20 日，蔡惠如曾利用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志多人共同面見田健治郎的機會，建議總督府廢止臺灣外國旅券之規則，田健治郎的答覆是：「予告南支臺灣籍〔籍〕民匪行之事情，為排日之一原因之事實，答不可廢止之意。」並加按語說：「彼等屈服，尚希望他方法之講究而去。」顯見蔡惠如長年往來於中國、日本、臺灣等地，對日本官方的管制政策十分不滿，至於田健治郎所謂「彼等屈服」，應該只是表象。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相關訊息。

3. 櫟社「多元圖像」的新發現

過去學界對櫟社的研究，大多強調其民族意識或抗日性格，近年學界研究已逐漸修正這種「定於一尊」的論點，而強調其社員的差異性與多元並存的圖像；⁴⁹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亦可為重新建構該社的多元圖像提供新事證。事實上，櫟社成員非但沒有一致的政治立場，內部活動也並非始終和諧同調。1930年連橫退社引發的內部紛爭，就是一明顯事例。⁵⁰〈傅錫祺日記〉又有前所未見的新資料，可以藉此深刻思考文學結社之「集團性」與「變異性」糾葛，當事人是目前學界仍缺少研究的清水人王學潛（字卿淇）。據〈傅錫祺日記〉1927年4月20日記載：

張棟梁君函稱：櫟社第二回壽星會，應並招待王卿淇君，贊成此議者不乏其人云云。

而同年4月23日又記載：當天在霧峰召開櫟社總會時，曾討論王學潛的進退問題，「決定託張玉書君勸其退社，因意氣不合也。」究竟王學潛如何與櫟社「意氣不合」，仍有待詳考，⁵¹但他遭該社主流派排拒，則是明顯事實。然而，向來不是該社核心成員的張棟梁卻替他抱屈，巧合的是：1930年櫟社討論是否要開除連橫社籍時，張棟梁也是站在強烈反對（拒不蓋印）的立場，可見該社高舉「維繫斯文於一線」的大纛之下，內部隱藏的矛盾衝突由來已久。此事幸好因王學潛不久後病故（1927年5月）而自然消弭，免除社團內部可能提早引發的衝突對立。此雖然只是短暫出現的小波瀾，卻足以對櫟社內部運作與成員互動的多元立場，

⁴⁹ 詳細討論，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緒論，頁1-55；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前書論王石鵬、後書論林仲衡，都曾提出這類觀點。

⁵⁰ 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307-376。

⁵¹ 根據張深切之說，林幼春曾因贊成吳虞的「非孝論」，而與保守之士大打筆仗，喧騰一時。原文如下：「（幼春）率先響應吳虞的非孝論，在報紙上和王學潛、張淑子等人打過激烈的論戰，驚煞了臺灣全島的老學究。這次的論戰，堪稱為臺灣的小型五四運動，青年們擁護他為主帥，老學究方面以王學潛為大將，各引經據典，大戰數百餘合，掀起了臺灣言論界未曾有的大浪潮，由此促進了臺灣文化的進步甚大。」（見張深切著、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第一卷：里程碑（上），頁286。）筆者翻閱《臺灣民報》，發現王學潛曾發表〈學究錄〉一文（《臺灣民報》，1923年10月15日，第17-18版），對新知識分子之反傳統現象加以批判，主張青年應以孝為先。林幼春當年論戰的報紙，筆者猜測可能是在臺中發行的《臺灣新聞》，可惜今已亡佚未見，難知其詳。

有更細膩的理解。此事在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或《櫟社沿革志略》等相關史料都未見記載，⁵² 其參考價值由此可見。

4. 「崇文社」與「中教事件」相關資料

彰化崇文社的代表人物黃臥松，與傅錫祺往來頻繁，甚至常央請傅錫祺評選崇文社的徵文作品。藉由這些資料，可考察櫟社、臺灣文社、彰化崇文社的關聯與互動。如 1927 年 5 月 3 日：「黃臥松君寄來崇文社第百十四期課題〈好惡顛倒論〉一冊，囑為評選。」1927 年 5 月 6 日：「崇文社之〈好惡顛倒論〉作者，多拋卻題目或攻擊新學者，因此託辭送還，不為選取。」就此事例觀察，作為傳統文人的傅錫祺，並非是思想全然守舊的保守派，其對新學提倡者有一定程度的支持，這可能與受到櫟社社友思想之趨新取向長期薰染有關。

關於日治時期臺中佛教界以林德林為首的教派，效法日本佛教娶妻生子，引發輿論撻伐，因而爆發儒佛論爭的「中教事件」，⁵³ 〈傅錫祺日記〉也有相關記載，摘要如下。1927 年 12 月 14 日，吳子瑜函囑作〈破戒僧〉詩。1927 年 12 月 23 日內容為：

吳子瑜君因惡和尚基隆江善慧，臺北沈本圓、林覺力等，袒護臺中淫僧林德林，登報辱罵詩人及一切儒者，大為不平，函招往商對待方法。下午至臺中吳宅，陳懷澄、林幼春、及中友王石鵬、張棟梁、蔡子昭、梓舟諸君先後俱至。作唱詩及擊鉢吟。以金十一圓交蔡子昭君，文社之金也。

1927 年 12 月 26 日林烈堂召集多人對林德林提不信任事，12 月 28 日吳子瑜又邀集多人至吳宅密集討論：

⁵²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第一冊為 1927 年，但 3 月 21 日至 5 月 8 日缺。張麗俊當天有事未出席，《櫟社沿革志略》則是受限於「記社員之進退存亡，未嘗一著議論，謹守『風人敦厚』之教」（林幼春序文之語）的書寫原則，刻意不寫。

⁵³ 詳細討論，可參考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運動的開展與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收於氏著，《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此文對於儒釋兩社群由於文化資源的角力產生矛盾衝突有極深刻的分析，有助於對這場論戰及櫟社社員現實處境的理解。（以上學術資訊，感謝施懿琳教授熱心提供。）另外，翁聖峰下列二文則專就《鳴鼓集》一書加以探討，亦可參考：翁聖峰，〈《鳴鼓集》反佛教破戒文學的創作與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臺灣文學學報》9（2006 年 12 月），頁 83-104；翁聖峰，〈《鳴鼓集》反佛教破戒詩歌的意識與內涵〉，《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2（2009 年 12 月），頁 311-334。

下午應招至吳少侯〔按：吳子瑜〕君家，參加對惡僧辱罵儒者之對待方法。會議結局議決：對林德林由臺中市民對待之，對江善慧、林本圓，⁵⁴ 由吳子瑜君發討孽僧檄文於全島詩人以對待之，又組「風俗匡正會」以糾正一切陋俗。

此一風波關係儒佛論爭，傳統詩人與佛教人士激烈對抗，是當時文化界、宗教界的重大事件，這些記載可與相關研究相互對照補充。另一個有趣的議題是：根據《灌園先生日記》，林獻堂對爭議人物林德林似乎頗有好感，也有不少正向的互動，⁵⁵ 箇中意涵值得深入探討。

（二）現代性體驗：斷髮經驗、文學傳媒與境外知識的輸入

1. 身體改造：斷髮經驗的複雜意涵

關於日治初期斷髮運動，牽涉傳統性、現代性與殖民性的多重糾葛，逐漸受到學界重視。其中，以吳文星〈社會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變遷：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⁵⁶ 以及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⁵⁷ 等研究

⁵⁴ 林本圓應是「沈本圓」之誤記。

⁵⁵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11月16日：「赴靈山寺受戒會：余與五弟、垂勝聽江善慧講教，鄭松筠亦來，因時逼促遂不及聽德林講演。」11月25日：「林德林、鄭松筠、莊垂勝五時來訪，談論佛教二時間乃歸去。」這是日記中記載兩人互動的開始。1941年，霧峰林家為青桐林靈山寺向當局辦理登記接受寺廟管理，林德林曾居間協助，出力甚多，甚至成為名義上的住持。另外，1941年林德林也曾多次出席林獻堂提議成立的「讀詩會」活動，因此本年《灌園先生日記》常見林德林與林獻堂互動的記載，包括7月6、8、20日，8月10、20日、10月16、28日，11月26、27，12月30日等，如8月20日：「林德林三時餘來謂他所譯之〈正信問答〉近將出版，請為之作序，許之；又言組織佛學研究會，亦贊之。」1942年林獻堂支持林德林在臺中發起的「佛學研究會」，因此《灌園先生日記》在1942年常記載他出席該會活動，見1942年1月16、21日，6月11、14日，7月2日，9月13日，10月11、28日，11月8日，12月13、22日等。一直到1943、1944年，《灌園先生日記》仍有不少兩人往來之記載。相關討論，可參見林蘭芳，〈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收於許雲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573-674。

⁵⁶ 吳文星，〈社會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變遷：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收於氏著，《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247-304；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編，《認識臺灣歷史論文集》（臺北：該會，1996），頁209-256。

⁵⁷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年3月），頁81-119。

較具代表性，而筆者曾指導中興大學臺灣文學所研究生廖怡超，完成碩士論文〈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為題，則有更深入完整的探討。⁵⁸

筆者先前研究，包括 1996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及 2006、2007 年出版的兩本專書《櫟社研究新論》、《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⁵⁹ 曾有專節分別論及 1913 年 3 月舉行春會，櫟社詩人林癡仙、林獻堂、莊太岳、陳槐庭等，以〈髮〉為題的集體創作多首，從中分析他們面對斷髮的各種複雜心態。同時，也藉由對 1911、1913 兩張櫟社集體活動照片的比較，明確指出櫟社詩人斷髮的時間點，就在 1911-1913 年前後。⁶⁰ 而〈傅錫祺日記〉則提供更多關於斷髮的相關訊息，值得參考。

〈傅錫祺日記〉關於斷髮的描述頗為有趣，大致可分成兩階段來談。第一階段是 1911 年其長子傅春魁、次子傅春鐘，與傅氏三弟的斷髮。第二階段則是 1912 年，其本人與四子傅春鏡的斷髮。先看 1911 年的相關記載：

1911 年 1 月 31 日：接魁、鐘二兒信，請准剪去辮髮，蓋廿八日所發之信謂舊曆元旦將實行也。

1911 年 2 月 7 日：魁、鐘二兒請許其本日剪去辮髮（鐘兒本日已實行）。

1911 年 2 月 13 日：晚再歸省，元宵故也。以魁、鐘二兒剪辮事告室人，竟終夜涕泣，婦人之見識可笑亦可憐也。

1911 年 2 月 18 日：正午至臺中停車場待謝秋濤、袁錦昌，以金五円托其帶交魁、鐘二兒。秋濤為余言剪辮之事鐘兒實行，魁兒尚未。

1911 年 2 月 20 日：又接魁兒信，請允其斷髮。

1911 年 8 月 24 日：三弟斷髮，慈親憤泣至不能成寐，習慣之難除有如此者。

⁵⁸ 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⁵⁹ 分別見於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頁 167-168、298；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138-140；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63-65。

⁶⁰ 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書前所附書影及文字說明，頁 10-11。

1911年8月25日：晚寫信歸家，問慈親憤泣三弟斷髮有稍解否？

1911年8月26日：三弟斷髮，弟媳憤謀飲毒，為魁兒所覺，勸阻之，余接此消息故復歸也。

1911年8月27日：三弟婦又謀飲毒自盡，急以藥解其毒，余甚怒其所為。

根據以上記載，可歸納出幾點訊息：其一，傅錫祺家中最先斷髮的是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兩個兒子傅春魁、傅春鐘，他的兒子在臺北求學，斷髮之前寫信回家請求允許，他表示同意；比起好友張麗俊回信勸阻女婿袁錦昌的斷髮請求，⁶¹ 顯得開明許多。由於臺北是臺灣斷髮運動的發源地，且醫學校是由總督府所成立，校方宣導該校學生率先響應所致。其二，男性斷髮，家中女性普遍難以接受，反映傳統風俗的根深蒂固，去除不易。如傅錫祺兩個兒子斷髮，竟使傅妻「終夜涕泣」，因而引來傅錫祺「婦人之見識可笑亦可憐也」充滿嘲諷意味的斷語。而傅錫祺之三弟斷髮的後果，不僅使傅錫祺之母「憤泣至不能成寐」，更誇張的是其弟婦竟為此兩度欲服毒自殺，令他大感不可理喻。此一行為雖然較為極端，但背後反映庶民階層面臨時代變革之際常見的巨大失落感，在當時社會卻有其普遍性。⁶² 而女性面對男性斷髮的激烈反映，更從反面印證：傳統女性受到固有習俗的強烈束縛與制約，乃至源自男性中心的價值觀，早已內化為根深蒂固難以破除的意識型態。可見在新舊交替時代的改革過程中，追求女性身心的解放，乃是一條有待努力的漫漫長路。

傅錫祺自己雖然可以接受長子、次子與三弟的斷髮，但他本人則一直到1912年6月15日，出席櫟社十週年大會的當天才真正斷髮。相關記載如下：

⁶¹ 參見廖振富，〈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日常生活中的漢文書寫：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考察對象〉，收於王見川等著，《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9-292；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233。至於張麗俊這封信，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三冊，1911年2月11日，頁13。

⁶² 張深切在其《里程碑》一書中，曾提及幼年斷髮之事，可以印證這種巨大失落感，結合族群意識與現代性潮流的矛盾：「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且剃頭受日本教育，權做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剃完後，我用雙手遮頭，走進一個空房，再放聲大哭；回想以前穿長衫、疊馬褂，著『紅明鞋』，戴『碗帽子』（瓜皮帽）跟著母親跪拜，有個辮子，像隻馬，多麼文雅，如今馬褂馬尾都沒有了，像隻水牛，再穿著長衫馬褂紅明鞋，多麼難看！越想越傷心。」張深切著、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全集》，第一卷：里程碑（上），頁84-85。

- 1912年1月4日：聞痴仙、載昭二君與其他數人斷髮，往中央醫院觀之。
- 1912年6月5日：定製三枚洋服，セル紺色者，一套計金十四円五十錢。
(臺中洋服店本島裁縫匠也)。與本島人裁縫匠陳泉定製紺(天青)色セル背廣洋服一襲⁶³(衣褲各一)，價金拾壹円，準備斷髮故也，嗣定製同布洋服半臂一領，三領計金 | ヌ 8 元 [按：145元]。(底線為筆者所加)
- 1912年6月13日：晚餐後歸省，決計斷髮，欲向慈親請命也。途中遇雨，衣履盡濕。
- 1912年6月14日：午后與林草、賴扯頭、陳聯玉諸君為紀念攝影。
- 1912年6月15日：本朝喚理髮匠至寓所斷髮，鏡兒亦斷髮。午后與升三、滄玉、聯玉、載昭諸君同赴霧峰之萊園參與櫟社十年年會。
- 1912年6月28日：夜訪幼春于清來館，始知于本日斷髮。

據資料顯示，1912年全臺斷髮運動尚未形成全面性的風潮。原本斷髮運動初期，由黃玉階等人在1911年1月8日於臺北發起「斷髮不改裝會」；不改裝是考慮為了逐步推展，化解阻力的權宜措施。而櫟社的蔡惠如與連雅堂在臺中開風氣之先，率先決定在1911年1月30日，即將聯袂往臺南參加南社大會之前斷髮。⁶⁴不過，蔡惠如選擇斷髮又改裝，連雅堂卻選擇「斷髮不改裝」。⁶⁵

一年後，櫟社創始人林癡仙與另一位櫟社好友林載昭，選擇在1912年1月4日同時斷髮，傅錫祺還專程前往參觀，似乎已在預作準備。至於傅錫祺本人的斷髮準備，顯然是有計畫、有步驟的龐大工程：首先是十天訂作洋服三套，雖然

⁶³ 原日記作「脊廣洋服」，審查人提醒應是「背廣」，筆者向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吳奇浩(專研日治時期服裝)查證，得知「背廣洋服」即是西裝，「背廣」為日文(背広，せびろ)，筆者推測可能是傅錫祺一時筆誤，謹向審查人及吳同學致謝。

⁶⁴ 「本社記者謝汝銓氏。提倡斷髮不改裝會以來。各地響應。而臺中合昌商會理事連雅堂與臺灣米穀公司長蔡惠如二氏。經於本日正午。各將辮髮斷去。合拍一照為紀念。二氏原擬紀元節日。與臺北同志者寔行。因是日欲偕赴南社總會。恐有不便故先斷去。以為臺中人士之先導。又聞連氏斷髮之後。霧峰富豪林獻堂氏贈以禮服一襲為祝其革新之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1日，第2版。

⁶⁵ 「臺中自連雅堂蔡惠如二氏斷髮以後。四處響應。蔡氏雖已改裝。而連氏則仍長袍短褂。往來市上。尤覺冠冕堂皇。此則斷髮不易服之主義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7日，第3版。

耗費不少金錢，傅錫祺還是選擇同時斷髮改裝。接著是前兩天專程返家向母親稟報疏通，請求允許諒解，兼顧孝道與新時代潮流。前一天，並與幾位友人一起為即將剪去的辮髮造型留下紀念攝影，顯得無比莊重。至於他選定在櫟社十週年大會舉行當天斷髮，隨即出席這次廣邀全臺詩人出席，長達 4 天的大型集會活動，⁶⁶ 其實具有在公眾場合「展示」進步的意義。

另外，日記記載 6 月 28 日，這次大會結束十天後，林幼春也終於斷髮。值得玩味的是：林幼春在日治時期傳統詩人中，向來以思想進步著稱，年少時代常閱讀晚清的新思潮刊物與報紙，受梁啟超影響頗大，⁶⁷ 1920 年代甚至一躍而為臺灣民族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為何他選擇斷髮的時間，會比林癡仙、傅錫祺等人還晚呢？筆者推測，其實背後所反映的正是他個人心境掙扎，擺盪於髮辮所象徵的「族群身分的堅持」及「不衛生、落伍、不合時宜」的矛盾之中使然；換句話說，這正清楚映現「現代性」與「傳統性」乃至隱藏族群認同意識的衝突與糾葛。林幼春與一生堅持不肯斷髮的洪棄生有相當的交情，漢族意識十分強烈。而林獻堂在 1911 年 4 月，雖在臺中也發起「剪辮會」，⁶⁸ 但其思想意識與臺北「斷髮不改裝會」的宗旨，似乎有差異，廖怡超曾針對林獻堂發起剪辮會的言論進行分析：

林獻堂在剪辮會開會式中陳述其創會目的有三點：其一：在於時勢及臺灣之位置如何。其二：則以衛生之不宜。其三則以做事之不便。僅偏重以實務面陳述斷髮之便利，並未在同化母國之議題上有所著墨。第一點更是保留許多想像的空間，時勢可解讀為順應世界的斷髮潮流，而臺灣位置如何等語又做何解釋呢？從此則創會目的可見林獻堂雖贊成斷髮運動，但是對於斷髮運動與同化於日本母國的相關聯結可說是極力撇清，也因此中部斷髮活動一開始就與臺北的斷髮活動更多了一層複雜的「民族抵抗意識」，也使得斷髮運動在中部推行並不順遂。由林獻堂不參考臺北的會則而自言其會則要旨，可見當時林獻堂確有意避開同化之意味存在。⁶⁹

⁶⁶ 關於櫟社十週年大會的經過與盛況，參見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 112-119。

⁶⁷ 1911 年 4 月梁氏來臺中訪問，對林幼春讚譽備至，譽之為「海南才子」，兩人互動及唱和情形，參見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頁 60、263-266。

⁶⁸ 〈中部剪辮會開會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7 日，第 3 版。

⁶⁹ 廖怡超，〈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頁 64-69。

以上觀察一針見血指出：同樣提倡斷髮，北部人士會強調目的之一是藉此改造身體，以加速同化，成為日本國民；⁷⁰ 而中部櫟社成員的斷髮主張與思想意識，則僅基於改造身體迎向現代文明，以去除落伍標誌，對日本當局仍存有民族認同上的抗拒思維。可見林幼春對斷髮的抉擇，顯得遲疑而落後，而其背後實隱藏著複雜的考量，甚至存在著拉扯與掙扎。

2. 文學傳媒之籌組與運作：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之發行

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的重要性，目前逐漸被學界所重視，研究成果日豐。⁷¹ 而該社之成立與《臺灣文藝叢誌》的編輯，〈傅錫祺日記〉都有相當密集的相關記載，可以具體勾勒出櫟社主導臺灣文社的成立，積極尋求全臺各地文友支持，乃至募款順利，有助該刊實際發行的經過。相關記載甚多，以下摘錄數則以見。

1918年9月20日：晨與載昭同車下大肚馱，合槐庭同趣牛罵頭，夜開櫟社雅集于蔡惠如君之伯仲樓，社友及鰲西、新竹兩社友至者三十餘人，亦盛會也。

⁷⁰ 1911年2月11日，「斷髮不改裝會」正式在臺北舉行，發起人黃玉階在會上有以下發言：「夫為母國之子民，須從母國習慣風俗，以期臻於同化，進一步與母國人負同等義務，一旦有緩急，與母國人同一種扶翼天壤無窮皇運，如是庶不負陛下視同仁厚德、歷任治臺督憲培栽覆庇之深恩，是則本會之主旨及動機之大槩也。」又說：「況自隸帝國版圖以來，較朝鮮已多十餘年之久，文明沾染，日漸維新，自當首先開創，奚可反居人後乎？且辮髮之塵垢，有碍衛生諸多不便，盡人知之，無俟贅言。惟本島幸為大國民，宜遵從國制，豈可同一國民而有異裝乎？是斷髮為島民之義務，分所應爾也。」（引文由作者重新標點）上述發言，清楚強調發起斷髮會的主要動機與目的，都是為了同化於日本母國，成為真正的日本國民。參見〈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13日，第2版。

⁷¹ 臺灣學界關於「臺灣文社」之研究，單篇論文有：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家臺灣文學館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9日；柯喬文，〈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收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2005臺中學研討會：文采風流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05），頁465-521；薛建蓉，〈現代性的變奏：《臺灣文藝叢誌》一個文化剖面重構〉，發表於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主辦，「第三屆中區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論文研討會」，2007年6月8日。至於首部以《臺灣文藝叢誌》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則是吳宗暉，〈《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傅錫祺出席櫟社與鰲西吟社的聯吟會。日記雖只記錄櫟社、鰲西吟社與竹社等社友 30 多人出席，未提及蔡惠如曾提議成立臺灣文社。但他在《櫟社沿革志略》曾清楚記載此事。此行傅氏共停留三天兩夜，9 月 22 日晚上始歸。

1918 年 9 月 23 日：午后訪林子瑾，夜與諸友均為留宿。

1918 年 10 月 7 日：晨赴臺中訪林子瑾君，繼訪林烈堂、鄭汝南諸故友，晚歸。

根據日記後續記載判斷，拜訪林子瑾的目的，可能是正開始具體商討成立臺灣文社的事宜，以下數則可證。

1918 年 10 月 8 日：接陳滄玉君起草之文社社則，即函告子瑾、惠如二君，約林幼春君。」（底線為筆者所加）

由此則記載可知〈臺灣文社規則〉，是由櫟社社友陳瑚（字滄玉）所起草。

1918 年 10 月 10 日：訪林幼春君於阿罩霧，夜止宿焉。

1918 年 10 月 12 日：蔡惠如君寄來金三百，謂係林熊徵寄贈臺灣文社。

1918 年 10 月 14 日：晨赴臺中，以熊徵之金交林子瑾君。匯金往上海買半夏。寓書於洪以南、謝汝銓、魏潤菴、趙雲石、連雅堂、莊士勳、陳百川、林耀諸氏，乞贊成臺灣文社。

1918 年 10 月 15 日：寓書嘉義之陳家駒、白玉簪、許紫鏡、葫蘆墩之施梅樵諸氏，乞贊成臺灣文社。

傅錫祺將林熊徵的捐款轉交林子瑾，並自此日起連續兩天，分別寄信給洪以南、謝汝銓、魏潤庵、趙雲石、連雅堂、莊士勳、陳百川、林耀（亭），⁷² 嘉義陳家駒、白玉簪、許紫鏡、葫蘆墩施梅樵等人，這些人都是各地舉足輕重的漢學界代表人物，傅錫祺代表櫟社尋求他們對臺灣文社的支持，目的是為壯大聲勢，並擴大與影響力。

⁷² 原日記作「林耀」，疑漏「亭」字。

- 1918年10月25日：晨赴臺中，分寄〈臺灣文社規則〉於中南北各地。
- 1918年11月8日：晨訪林子瑾君，聞其母言：發刊《文藝叢誌》之志，已為之餒。
- 1918年11月9日：鈔臺灣文社之課卷。
- 1918年11月10日：又作孔教論一篇。鈔文課卷也。
- 1918年11月12日：晨赴臺中順訪黃子清、鄭汝南、林子瑾諸君午歸。夜作淫書淫戲禁革議一篇。寄詩卷託莊竹書、謝雪漁二氏評選。
- 1918年11月13日：鈔募集文。致書臺南連雅棠君，索文藝叢誌祝詞。
- 1918年11月21日：發書於各地，託查各社吟友住所氏名，並推薦林仲衡外五氏為文社評議員。
- 1918年11月22日：寄文社文卷，託吳德功氏評選。
- 1918年11月27日：發信請託文社第三四期課卷之詞宗。
- 1918年11月28日：晨赴臺中，為文社事務也。
- 1918年11月30日：鈔文社第二期徵詩。
- 1918年12月1日：新竹鄭拱辰氏匯到金三百圓寄附臺灣文社。
- 1918年12月2日：以鄭拱辰氏寄附文社之三百金小切手交欽福，即索領收証寄與鄭氏。
- 1918年12月4日：鈔文社徵詩。
- 1918年12月6日：鈔文社徵詩。
- 1918年12月7日：寄文社徵詩託趙雲石氏評選。
- 1918年12月8日：寄文社徵詩託施梅樵氏評選。
- 1918年12月16日：晨赴臺中，編輯《臺灣文藝叢誌》。
- 1918年12月17日：晨赴臺中，視《文藝叢誌》印刷事。
- 1918年12月14日：寄復書於陳滄玉君，報文社近況。
- 1918年12月19日：晨赴臺中，校讎《文藝叢誌》。
- 1918年12月23日：晨赴臺中，視《文藝叢誌》印刷事，則已全部排印矣。
- 1918年12月28日：至林子瑾君處，準備《臺灣文藝叢誌》封寄事。
- 1918年12月29日：寄《臺灣文藝叢誌》與鐘兒。

以上是〈傅錫祺日記〉1918年9至12月中，關於《臺灣文藝叢誌》創立到實際編輯創刊號的重要記事。其中較重要的訊息包括：臺灣文社規則是陳瑚所起草，傅錫祺實際寄信給南北各地，調查各地詩社社員地址以方便聯繫，鄭拱辰、林熊徵都曾贊助300元寄附金等。至於1919年起，1-3月間他幾乎全力進行《臺灣文藝叢誌》的編輯，重要記載如下：

1919年1月10日：寓書周紹祖、洪月樵、陳梅峰三氏，推薦為臺灣文社評議員。

1919年1月14日：午赴文社。

1919年1月16日：晨至文社。

1919年1月30日：晨至臺中領文社徵文贈品《事類統編》及徵詩贈品。

1919年2月1日：午至臺中校對《文藝叢誌》，八木巡查調查臺灣文社所關諸事。（底線由筆者所加）

1919年2月6日：午后至文社，分送第二期徵文徵詩贈品。

1919年2月8日：晨赴文社囑匯金往上海買書，以作徵文徵詩贈品。

1919年2月9日：作文社課題〈漢文帝論〉一篇。

1919年2月10日：晨赴文社，分送第三期徵文徵詩贈品。

1919年2月11日：抄第四期徵詩。

1919年2月12日：晨至文社發行第二號叢誌。

1919年2月14日：再作〈漢文帝論〉一篇。

1919年2月17日：晨至文社交江登魚君之社費金，即歸。

1919年2月18日：寄第四期課卷，託文宗評選。

1919年2月22日：午至報社，校讎第三號文藝叢誌。

1919年2月24日：午至報社，校對叢誌。

1919年2月26日：午后至報社，校對文誌。

1919年3月11日：至文社，視發送第三號文誌。

1919年3月14日：晨赴文社，發送第四期徵文徵詩中選者贈品。

1919年3月21日：晨赴文社。自文社攜楚辭集註、三蘇文、集古詩源等書歸來。

1919年3月22日：晨赴文社，午返。

1919年3月29日：晨至文社，午歸。

以上的日記資料，不但詳細鋪陳臺灣文社實際成立的過程、如何進行全島串聯，以及資金的募集，也透露傅錫祺實際主編、督印《臺灣文藝叢誌》的流程與細節。傅錫祺在「臺灣文社」創立之初所扮演角色的重要，由此可見一斑。當時，傅氏已從服務10多年的報社離職，但《臺灣文藝叢誌》創辦之初，卻是利用《臺灣新聞》社的印刷設備，應該也是基於他過去長期任職於該報的人脈關係便利。

另外，1919年2月1日的傅氏日記提到：「八木巡查調查臺灣文社所關諸事。」這則記載雖然只有簡短一句話，卻清楚揭露日本官方監視臺灣人文學結社與傳播媒體的事實，可見官方對文學結社仍充滿戒心。日後臺灣文社開會，曾討論刊登文章是否可涉及政治議題時，部分社員建議不宜涉及政治，引發言論尺度與發展路線的爭議，可謂其來有自。⁷³

1920年以後，由於傅錫祺個人身體健康的因素，櫟社社員蔡子昭逐漸接替傅錫祺，擔任該刊實際的編輯工作。不過傅錫祺仍負責保管文社基金，傅氏日記中也有記載如下：

1920年1月14日：鄭汝南君來書，謂有人謂其反對蔡子昭君入文社，余大怒之云云，余復以無是事。

1920年1月27日：晨赴文社，蔡子昭君亦踐約而至，相與約定就職期日。

1921年4月21日：以臺灣文社之金二百二十元交蔡子坤君。

1921年6月29日：蔡子昭君來訪，支去文社貯金百八十四元。

1922年以後，該刊因財務吃緊，運作日益艱難的狀況，日記中也透露部分訊息：

⁷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五冊，1920年9月26日，頁309。文中記錄：「往臺中州林子瑾家赴臺灣文社集會。是午，會員出席者三十餘人，文社支部長林仲衡出告開會並演說社則，雜誌不得言及時事並政治。繼陳朔方侃侃談實行研究會主旨，繼陳滄玉、陳聯玉、林幼春、林獻堂出辨駁〔辯駁〕雜誌不得毀謗時事，政治非不得言及，方今漢學就衰，正要文人討論云云。」

1922年2月17日：林子瑾氏寄手形〔按：支票〕一枚，囑為保證人，文社向協贊信用組合借金也。

1922年3月8日：蔡子材氏來訪，為文社借金，挽予為保也。

1922年9月9日：午赴臺中，以文社寄存潭子信用組合之金十一元八十四錢交付林子瑾君（在曜生醫院）。

1922年12月24日：午后赴臺中吳子瑜君處，開文社理事會，協議明年繼續維持文藝叢誌事。

可見到了1922年，文社已經頻頻向金融機構借款，始能繼續發行。翻閱1923年傅氏日記，全年都未發現任何有關臺灣文社的記載，可能傅氏已逐漸淡出文社的實際運作，該刊經營似已逐漸邁向衰微。

另外，由於《臺灣文藝叢誌》目前分散各圖書館與民間單位或個人，蒐羅不易，關於該刊發行時間究竟為期多久？真實情況不明。學界長期以來都採信共計發行7年之說，不過根據吳宗曄的長期努力，蒐集所得的最後一個年度是1924年11月15日發行的第6年第10號。雖然這一期並未刊登即將停刊的消息，但吳宗曄推論可能就是最末一期。⁷⁴此一推論，筆者根據〈傅錫祺日記〉以下的相關記載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1924年12月23日：寓書蔡子昭君，問《文藝月刊》已擬由來年休刊，何不豫告社員？

綜合上述資料，〈傅錫祺日記〉對考察臺灣文社的運作，乃至《臺灣文藝叢誌》的編輯與發行情形，都提供了前所未見的寶貴資訊。如果配合傅氏家中珍藏的其他資料，包括傅氏往來書信、徵詩及徵文資料，對從事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的研究，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3. 境外知識之移入：向日本、中國購書之相關記載

傅錫祺的日記中，常見他向日本、中國，乃至臺灣島內之各大書局購書的紀

⁷⁴ 參見吳宗曄，〈《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第二章第二節〈《文誌》的歷史沿革〉之二「發行情形與存佚考察」，頁34-43。

錄，多半詳細記錄書局、出版者名稱、書刊名、書價。其中有的是他本人購買，有的則是受朋友所託代購。購書性質相當多元，從中國古典詩文經籍，到晚清《新民叢報》，從科學讀物，到世界局勢與地圖。遠比〈林癡仙日記〉的記載詳細而豐富，從中不但可以考察傅錫祺作為傳統文人的閱讀與思想演變軌跡，也可以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中國、日本之間，傳統與現代文化資訊的跨界傳播途徑，以及流通情形。

筆者曾初步整理〈傅錫祺日記〉中的購書紀錄，概分成「傳統古籍」與「現代新學」兩大類，數量相當龐大。以下先集中在現代新學的購書紀錄，整理列表（表二至表五），以方便討論觀察。

表二 購自中國：現代新學書刊雜誌資料

書名	來源	相關人物	價格	日記出處
飲冰室集	中國書林			1908/4/18
中國近世地理誌	中國書林			1911/12/2 發信
不忍雜誌	上海廣智書局	代林癡仙、林載昭購買	代購	1913/2/27
政治汎論	上海廣智書局			1913/5/16
不忍雜誌	上海廣智書局	代陳槐庭、秋清購買	寄金九元	1913/6/26
四大政治家學說外一種	上海廣智書局		郵到	1913/7/7
六大政治家	上海廣智書局	林癡仙	發信代購	1914/3/16
小說月報六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		十五元	1915/6/28
《飲冰室文集》	上海振寰書局	將與鄭汝南君合贈陳聯玉	二元八十五錢	1916/5/17、1916/6/9 郵寄陳聯玉
上海各報		上海陳槐庭 (當時陳在中國)	匯金託陳代購	1917/5/30
飲冰室全集	中華書局		匯金九元	1917/6/13 匯金、 1917/7/4 買到
清朝全史	向上海函購寄到		自藏	1918/1/21
東西洋諸史	向上海商務印書館函購		自藏 匯金二十元	1918/2/12
飲冰室全集	上海中華書局寄到	代林瑞仲君豫約	代購	1918/4/9
日本六法全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郵到		自藏	1920/7/24
地方自治講義				
地方自治淺說				
日本地方制度				
自治制書二種	上海商務印書館寄到			1921/1/23

表三 購自日本：現代新學書刊雜誌資料

書名	來源	相關人物	價格	日記出處
近世中國秘史一冊	新民叢報社寄來			1904/11/23
歐洲十一國遊記(第一冊即意大利遊記)一冊,東西事物起原一冊	新民叢報社寄來		據 1906/5/8 日記推測 應價一円卅五錢	1906/5/5
新大陸遊記	新民叢報社寄來		價金壹円, 郵稅九錢	1907/8/1
飲冰室文集	新民叢報社			1908/3/26 發信、
最近外交史	東京布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博文館	寄金購買	48 錢	1906/12/12
最近外交史	博文館			1907/1/1
拿破崙全傳	嵩山堂			1907/6/19
西洋歷史	青木嵩山堂		寄振替貯金五十八錢	1907/7/20
校刻日本外史	嵩山堂			1917/8/7 欲買日本史已售盡、 1917/8/22 改買日本外史
世界歷史譚三十六冊	向東京博文館郵購	寄贈潭子圖書閱覽所	轉贈 匯金十円八角	1925/5/5
伊藤伯、李傅相兩雄會見書一冊	往馬關訪春帆樓時購入		自藏	1925/6/14

表四 購自日本：工具書、教科書

書名	來源	相關人物	價格	日記出處
和文漢譯秘訣一冊	向東京大學館購買		寄金十九錢	1902/10/19
書翰文大全	嵩山堂			1907/6/19
談話美辭法	青木嵩山堂		寄振替貯金五十八錢	1907/7/20
大阪每日新聞元日報紙中夾世界地圖			三角	1909/1/9
衛生書	發信往丸山社		購買	1909/2/12 發信、 1909/3/1 收書

表五 購買處不明：現代新學書刊雜誌資料

書名	來源	相關人物	價格	日記出處
飲冰室政治論集		林獻堂	囑代分售諸友	1911/8/1
小說數種		林烈堂	囑購	1913/10/13
日臺會話大全			八十錢	1915/2/9
國語教本			一元二十錢	1915/3/25
清朝野史大觀一部十二冊	自購		自藏, 價金三円	1921/11/13
新思想の解剖一部二冊	自購		自藏, 價金四円二角	1923/3/1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	自購		自藏, 價金大洋一元	1925/7/20

雖然以上僅是根據日記所載資料的初步整理，但已提供相當豐富多元的觀察面向，筆者嘗試分析如下：

(1) 傅錫祺由於在報社長期任職的經驗，接觸境外知識與相關資訊有其便利性，從中可看出他相當熟悉當時中國與日本的出版資訊及購書管道。他不但自購，也常代朋友購書，購書來源包括中國、日本、臺灣。中國方面，包括中國書林、中華書局，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振寰書局、廣智書局；日本方面，主要有東京大學館、博文館、大阪嵩山堂、丸山社。從中可以考察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日本的出版狀況，乃至向臺灣輸入的跨界知識傳播情形。

(2) 傅錫祺雖出身舊學背景，具有前清秀才身分，漢文根底相當深厚。但他早在 1901 年就在日本人設立的報社任職，並常擔任文稿翻譯工作，因此學習日語有其現實需求。1902 年 10 月 19 日，他向東京大學館購買《和文漢譯秘訣》一冊，應是基於工作所需。1906 年 7 月開始決定自學日文，⁷⁵ 1915 年 2 月 9 日曾購買《日臺會話大全》一冊，同年 3 月 25 日又買《國語教本》一冊，7 月 24 日還到公學校複習日文，凡此種種都可看出他學習日文的積極與努力。他的好友林癡仙，曾先後向櫟社詩人莊雲從、日本人池田與簡姓青年數度學習日文，最後不了了之，⁷⁶ 傅錫祺的恆心與毅力顯然高出很多。1921 年起還密集在地方上協助推動「國語研究會」，可能是由於他擔任潭子庄長的職責所在。比起林幼春基於族群意識的抗拒，終生不學日文，傅錫祺的選擇較趨向務實，因而形成鮮明的對照。

(3) 筆者 1996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曾根據林癡仙的購書紀錄，指出櫟社成員雖多出自舊學背景，但 1906 年組織化之始，在成員相互激勵之下，就帶動吸收新學知識的風氣。而目前從筆者整理的〈傅錫祺日記〉中，可清楚看出傅錫祺購書種類更為多元，數量更為龐大。其中康有為與梁啟超兩人的著作，很明顯是當時臺灣文人的必讀對象，《飲冰室全集》是他購買自藏、贈送或轉售最多的一

⁷⁵ 〈傅錫祺日記〉，1906 年 7 月 24 日：「夜習國語數句，擬自本日將學習之也。」至於傅錫祺是否曾正式從師學日文，目前所見資料不足以查考。

⁷⁶ 林癡仙想學日文，可見於〈林癡仙日記〉，1906 年 8 月 2 日的記載。從當天日記可知，他曾先後向詩友莊雲從、日本人池田，及潭仔墘庄保正簡本之子簡永祿〔按：時正就讀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豫科〕等三人學日語。又見《詩存》卷二〈次和雲從見贈韻〉：「多藝久諳大和字……已許異書親口授，莫違相約惹相思。」但隔年的詩作卻又說：「誰能苦學鮮卑語，博笑人前戲潑寒。」（〈春日雜感，次粵臺秋唱韻〉八首之六），反映他無心專注學習日文，前後矛盾的心情。

套書，購書來源包括中國書林、上海廣智書局、中華書局等。1911年8月1日林獻堂甚至將40冊《飲冰室政治論集》請傅錫祺代分售友人，這是在梁啟超接受林獻堂邀請訪臺4個月後的事。另外，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社還陸續寄來《近世中國秘史一冊》、《歐洲十一國遊記》、《東西事物起原》、《新大陸遊記》等書，梁氏著作之風靡臺灣，可見一斑。再者，康有為曾在1913年創刊《不忍》雜誌，傅錫祺在創刊之始，便兩度代林癡仙、林載昭、陳槐庭等人購買，接觸新知識之快速積極，幾乎與中國、日本「零時差」。

(4) 傅錫祺購買或收藏的新學書籍種類包羅萬象，主要集中在法律、政治、歷史、地理等範疇。法律、政治類，有《日本六法全書》、《地方自治講義》、《地方自治淺說》、《日本地方制度》、《自治制書二種》、《四大政治家學說外一種》、《六大政治家》等；史地類，有《中國近世地理誌》、《清朝全史》、《東西洋諸史》、《近世中國秘史一冊》、《最近外交史》、《拿破崙全傳》、《西洋歷史》、《校刻日本外史》、《世界歷史譚》三十六冊、《伊藤伯、李傅相兩雄會見書一冊》、世界地圖（大阪每日新聞元日報紙中夾）、《北京歷史風土叢書》、《清朝野史大觀》（一部十二冊）等。另外，還有日文思想性書籍《新思想の解剖》等，反映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知識分子普遍具有放眼世界、吸收新知，以期跳脫傳統侷限的強烈企圖。舉凡歷史、地理、政治、法律等相關知識，都是著眼於全球性的關照視野。

(5) 1925年5月5日，傅錫祺向東京博文館郵購《世界歷史譚》三十六冊，目的是寄贈給潭子圖書閱覽所，顯示他愛護鄉土、關懷人文的具體行動。而當時已有地區型的「圖書閱覽所」，類似當今的公共圖書館功能，顯示知識傳播逐漸普及化，意義非凡。可見當時臺灣文化協會以追求改造思想、知識啟蒙為鵠的，乃至日本殖民體制也致力於基層民眾的社會教育，逐漸形成一股新興的社會趨勢。

五、結論

本文主要鎖定文學與文化議題，初步分析〈傅錫祺日記〉對臺灣文史研究可提供的貢獻，文中分別就「文學結社」與「現代性體驗」，進行初步的整理耙梳，應可顯示這套日記的參考研究價值。在文學結社方面，本文切入角度有四：(1)

櫟社集資買彩票的意涵，從中除可理解櫟社崇高的成立宗旨之外，注重現實經濟基礎的務實取向，這是文學社團能長期順利運作的重要基礎。(2) 連橫、蔡惠如等人事蹟之考察，諸如連橫在「臺灣新聞社」任職與辭職的時間、蔡惠如早年在臺中的活動，乃至其他櫟社成員的行蹤考察，這套日記都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可修正前人記載的錯誤，或填補臺灣重要人物生平事蹟的空白，史料價值甚高。(3) 櫟社「多元圖像」的新發現，近年對櫟社研究逐漸強調其多元風貌，並反對從單一立場加以定位，日記所載王學潛遭該社核心成員排斥的事例，可為上述論點添加有力的新事證。(4)「崇文社」與「中教事件」相關資料，可提供考察日治時期傳統文社運作，及儒佛論爭的佐證資料。至於「現代性體驗」，則分別就下列三個議題加以分析：(1) 身體改造：「斷髮」相關記載之意涵(2) 文學傳媒的籌組與運作：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3) 境外知識的移入：向日本、中國購書的相關記載。這類資料與當前學界新興的研究議題密切相關，應能提供研究者不少新資訊。

由於〈傅錫祺日記〉之涵蓋時間相當長，加上他社會角色的多樣性，參與的活動領域也很廣泛，即使其日記每日記錄的內容大都相當簡略，仍可提供臺灣文史研究非常豐富的史料，諸如：日治時期經濟史、傳播媒體、地方事務、產業活動、公共衛生、基層教育、日本殖民統治史等，事例甚多；由於篇幅與個人專業領域的限制，本文都未能納入討論。另一方面，關於傅氏個人思想與生活史的探討，⁷⁷ 乃至與其他櫟社成員日記的對照閱讀，都是未來可以開展的研究方向。

筆者另有一則令人振奮的發現：由於傅錫祺(1872-1946)與呂赫若(1914-1951)都是臺中潭子人，筆者在翻閱已出版的《呂赫若日記》時，驚喜的發現：根據呂赫若的結婚照顯示，傅錫祺曾出席呂赫若的婚禮，照片中新郎呂赫若英姿煥發的與新娘坐在前排正中央，而傅錫祺則站在最後排，推測他應該是以地方鄉紳的身分應邀出席。⁷⁸ 翻閱《呂赫若日記》書末所附呂芳雄的長文〈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有以下描述：

⁷⁷ 關於傅錫祺個人私領域的研究，參見筆者的文章，〈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家庭生活〉，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

⁷⁸ 可惜〈傅錫祺日記〉與《呂赫若日記》，1934年目前都未見，無法得知詳情。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按：父母親〕在建義堂結婚。外祖父給母親的嫁妝是「半廳面」。結婚當日祖父為了壯大場面，還邀請在當地有秀才之稱的仕紳，潭子庄長傅鶴亭先生蒞臨婚禮。⁷⁹

文中的傅鶴亭就是傅錫祺，他與呂赫若兩人代表日治時期不同世代的臺灣知識菁英典型，不論學經歷、個性、思想，各方面都形成強烈的對照與世代差異。研究兩人的日記內容，不但可看到臺灣近代社會的縮影，也可以品味兩種人格類型迥然異趣的心靈世界。總結本文的初步探討，筆者預期關於臺灣人物日記的研究，未來應該有機會開展出非常豐富多元的面向，其研究前景應可寄予相當樂觀的期待。

⁷⁹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第二冊（中譯本）：1942-1944，頁465。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繪，「日治時期鐵路車站分布圖」，下載日期：2011年7月15日，網址：thcts.ascc.net/template/sample6.asp?id=rd15-07021。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大鐸版)，下載日期：2011年3月6日，網址：<http://140.120.81.240/ddnc/ttswebx?@0:0:1:ttsddn@@0.7471459490363714#JUMPOINT>。

王見川等(著)

2005 《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

江燦騰

2001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吳文星

1988 〈日據時期臺灣彩票制度之探討〉，《師大學報》33: 283-300。

1992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1996 〈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編，《認識臺灣歷史論文集》，頁209-25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吳文星等(主編)

2001-2009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吳宗曄

2009 〈《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

2004 《呂赫若日記》。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李毓嵐

2008 〈〈林獻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37-8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文月

2010 《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淑慧

2008 〈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13: 65-92。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0-2011 《灌園先生日記(一~二十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林蘭芳

2008 〈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頁573-67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施懿琳

- 2001 〈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 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家臺灣文學館暨國立文化產保存研究中心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8-9 日。

柯喬文

- 2005 〈日治前期漢文傳媒與現代性研究：臺灣文社與《臺灣文藝叢誌》〉，收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2005 臺中學研討會：文采風流論文集》，頁 465-521。臺中：臺中市文化局。

孫大川

- 2008 〈身教大師 BaLiawakes (陸森寶)：他的人格、教養與時代〉，《臺灣文學學報》13: 93-150。

翁聖峰

- 2006 〈《鳴鼓集》反佛教破戒文學的創作與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臺灣文學學報》9: 83-104。
2009 〈《鳴鼓集》反佛教破戒詩歌的意識與內涵〉，《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2: 311-334。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主編)

- 1998 《張深切全集》，第一卷：里程碑。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

- 2000-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中：臺中縣文化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俊雅、楊洽人(主編)

- 1998 《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許雪姬

- 1998 〈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中縣文獻》6: 1-34。
2000 〈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第 1 冊，頁 1-51。臺中：臺中縣文化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8 〈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 151-178。
2011 〈「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18(2): 97-145。

許雪姬(總編輯)

- 2008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麗娜

- 2009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收錄之對聯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

傅錫祺

- 1992 《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
1993 《櫟社沿革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曾士榮

- 2008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 1-64。

賀安娟

- 2008 〈生活在大都會：臺灣人旅日回憶錄〉，《臺灣文學學報》13: 179-204。

黃美娥

-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07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
- 2006 〈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 81-119。
-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 2008-2010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
- 2007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臺北：國史館。
- 黃琇紋
- 2009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之臺灣文學史料分析〉。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怡超
- 2009 〈日治初期臺灣「斷髮」運動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廖振富
- 1996 〈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5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日常生活中的漢文書寫：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考察對象〉，收於王見川等著，《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9-292。臺中：臺中縣文化局。
- 2006 《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
- 2007 《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
- 2010 〈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家庭生活〉，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
- 鄭喜夫
- 1992 《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賴恆毅
- 2007 〈張麗俊及《水竹居主人日記》之文學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薛建蓉
- 2005 〈現代性的變奏：《臺灣文藝叢誌》一個文化剖面重構〉，發表於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主辦，「第三屆中區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論文研討會」，2007年6月8日。
- 簡吉（著）、簡敬等（譯）、陳慈玉（校注）
- 2005 《簡吉獄中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羅琬琳
- 2009 〈傅錫祺及其《鶴亭詩集》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Discovery and Research Value of “Diary of Fu Xiqi” : Discussion on Issues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hen-fu Liao

ABSTRACT

The discovery and compilation of diaries of figures in modern Taiwan has made profound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Led by Professor Hsu Xueji and teams,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had compiled and published two diaries *The Diary of Mr. Lin Guanuan* by Lin Xiantang and *The Diary of the Host of Shui-Zhu Hut* by Chang Lijun that the authors were both members of the Li Poet Society. Due to years of study on the Li Poet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in 2006 from the descendants of Fu Xiqi the Chair of Society, the author has accessed the Fu’s diary of 35 volumes. With the support of Fu’s family and under the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Fu’s diary is underway.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discovery and compilation of Fu’s diary. Apart from a brief biography of Fu Xiqi and a comparison with diaries of four other members of the Li Poet Society, the paper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discourses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o illuminate the value of Fu Xiqi’s diary, two issues of “Formation of poetic societies” and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are put under spotlight. To the analysis on “Formation of Li Poet Society”, the discussion explores (1) the meaning of fund raising for Li Poet Society by purchasing lotteries, (2) the newly uncovered stories of Cai Huiru and Lian Heng, (3) the discovery of “Multiple images” of Li Poet Society, and (4)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hong-Wen Literary Society” and “Zhong-Jiao Event”. In regard to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the analyses are on (1) body transformation: the complex meaning of plait cutting, (2)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literary media: Taiwan Literary Society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Art Series”, and (3) import of offshore knowledge: records of Fu’s book purchase from Japan and China. To the abundance of stories and topics in Fu’s diary, the author expects further research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with scholars.

Keywords: Fu Xiqi, Li Poet Society, Diary Research, Modernity, Traditional Literati

